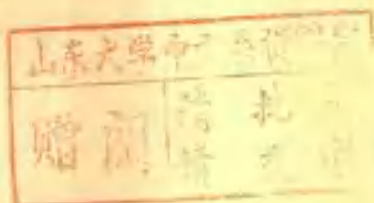


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

(下)



一九七八年五月

51
号 43.2 1
军事学院军事资料室

目 录

(二)

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

郭沫若：抗战与文化问题·····	(1)
抗战以来的文艺思潮·····	(5)
周 扬：新的现实与文学上的新的任务·····	(8)
抗战时期的文学·····	(20)
茅 盾：论加强批评工作·····	(30)
暴露与讽刺·····	(34)
※ ※ ※	
郭沫若：新文艺的使命·····	(37)
张天翼：论“无关”抗战的主题·····	(46)
罗 荪：再论“与抗战无关”·····	(55)
附录：	
梁实秋：编者的话·····	(58)
“与抗战无关”·····	(60)
※ ※ ※	
欧阳凡海：什么是“战国”派的文艺·····	(63)
附录：	
“战国策”，本刊启事·····	(75)
陈 铨：民族文学运动（摘录）·····	(76)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	(83)
实现文艺运动的新方向，中央文委召开党的文艺工 作者会议……	(86)
艾思奇：从春节宣传看文艺的新方向……	(93)
周 扬：新的人民的文艺……	(99)

※ ※ ※

周 扬：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	(123)
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肖军问题的决定……	(148)
东北文艺协会关于肖军及其《文化报》所犯错误的 结 论……	(150)
郭沫若：斥反动文艺……	(155)
何其芳：关于现实主义……	(161)
荃 麟：论主观问题……	(177)
默 涵：个性解放与集体主义……	(210)

附录：

王实味：政治家，艺术家……	(217)
野百合花……	(221)
丁 玲：三八节有感……	(229)
肖 军：论同志之“爱”与“耐”……	(233)
罗 烽：还是杂文的时代……	(238)
舒 芜：论主观（摘录）……	(240)
胡 风：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	(259)
肖 军：抚今追昔录（摘录）……	(265)
原夜抄之三……	(267)
政教泛谈……	(268)
沈从文：从现实学习（摘录）……	(270)
朱光潜：自由主义与文艺……	(280)

抗战与文化问题

1938年（民国27年）

郭沫若

“抗战与文化问题”——当我接受这个命题的时候，首先在我脑子里所浮现出来的，便是医学的一片理论。

我们人体是有自然疗养力的，凡是外来的细菌或他种物汁侵入了体内时，体内的自然疗养力便发动了起来向异物抗战。这抗战如是局部的便呈出局部症候，如是全面的便呈出全面症候。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疾病的原理。所谓疾病就是异物的侵入和对于这侵略者的体力的抗战。这侵入和抗战如是局部的，倒无关大局，如是全面的那情形便很严重。在这严重的全面抗战的时候，所有的体力几几乎都集中于抗战的一点，凡是过高的精神活动和体魄劳动都是停止了。最活跃的要算是循环系统和呼吸系统，其他各系统的活动多多少少是呈着静止的状态、而且是必须要呈示静止的状态，要这样，一切力量才能集中于抗战的这唯一的目的。

所谓医学也就是在于帮助人体的自然疗养力，除掉对于某几种病症有特效药，能施对本的治疗之外，所有一切的医术可以说都是对标的治疗。这对标治疗的根本原则，是要促进对于抗病必须的体力之集中，而驯致不必要的活动之静止。如打强心针，如养气吸入，这便是帮助循环系统和呼吸系统的活跃。如禁止作过度的思考，禁止感情的激动，禁止用硬性或有刺激性的食物等等，便是驯致静止状态的必需的

法门。故尔平时的营卫和病时的摄养，情形须有点不同，甚至有时相反。如平时打强心针，那是于身体不唯无益，反而有害；病时作过度的思考等等，结果是促进病势而至于死亡。

我想，当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遇着外敌的侵入而起来抗战的时候，那抗战过程和对于在抗战过程中的国家或社会的处理，应该和人体的抗病与医疗方术，在原则上不会有多么大的差异。尤其是在外寇作大规模的侵略，引起了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全面抗战，使它达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的时候，那情形和人体的得到重症，是相差不远的。在这时，整个国家或社会的力量便集中起来，在抗战上形成一个焦点。凡与抗战有益的活动便受着鼓舞，而于抗战无多大直接关系或甚至有害的活动便受着制止。这种情形的出现，有时是超出乎意识以外，大约也可说，一个国家或社会是同样地具备有自然疗养力的。

事实胜于雄辩，我们中国的目前便是最好的例证。自从“八·一三”以来，所有国内的种种颀颀状态几乎完全停止了，所有一切有利于抗战的力量也渐渐地集中了起来，就已感觉着有集中的必要。就简单拿文化问题来说吧，所有以前的本位文化或全盘欧化的那些空洞的论争，似乎早已是完全停止了。而在文化的分野里面受着鼓舞的，是抗战言论，抗战诗歌，抗战音乐，抗战戏剧，抗战漫画，抗战电影，抗战木刻等，举凡与抗战过程有益的精神活动。而最明显地受着了抑止的却是一两年风靡一世的幽默情趣和所谓渡越流俗的“反差不多”运动那种潮流。这是当然的。在目前必须打强心剂，需要养气吸入的中国，在抗战已成为流俗的中国，而要继续幽默下去，过着清高的渡越生活，那是未免有点非国

民的态度。抗战所必需的是大众的动员，在动员大众上用不着有好高深的理论，用不着有好卓越的艺术——否，理论愈高深，艺术愈卓越，反而愈和大众绝缘，而减弱抗战的动力。对于在全面抗战期中的社会而要求它作高深的理论的了解，卓越的艺术的欣赏，那等于是对于重症患者要求他作过度的思索并摄取甘美的饮食，那并不是在爱他，其实是害他，社会的“自然疗养力”便是对于在抗战期中的一般处理的绝好的指标。一切文化活动都集中在抗战这一点，集中于抗战有益这一点，集中在能够迅速地普遍地动员大众的这一点。这对于文化活动的要求，便是需要它充分的大众化，充分地通俗化，充分地产生多量的成果。但要使大众化和文化能够迅速地而普遍地接近，在文化问题的本身之外有必须预先解决的政治问题，便是除掉汉奸及汉奸理论的活动当阻止之外，所有一切与抗战有益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应该许以彻底的自由。要有这种自由，然后大众才有接近文化活动的机会，而文化活动也才能普及于大众，并深入于大众的可能。而从事于这种文化活动的人员之多量的养成，即是战时教育的实施，不用说也是先决条件之一。

真确的，所谓抗战理论并不怎么高深，否，实在是极端的单纯。敌人大规模的侵犯是企图灭亡我，我如不起来抵抗，便是坐而待亡。但敌人是外强中干的，因为他缺乏种种的资源，所以才来孤注一掷地对我作大规模的侵犯，我如彻底的加以抵抗，便是断绝敌人的资源而促进敌人的灭亡。所谓“抗战到底、最后的胜利必属于我”的理论，的确是很简单的。但我们需要有多量的方法来表现这种理论，并需要有多量的机会来发挥这种理论，务使理论化而为行动。对于这种理论的表现的发挥是应该不厌其繁复的。因为理论虽

简单，而对于大家并未做到深入而普及的地步。大众既需要简单的理论，而尤需要这种理论的翻来复去的重述。普及并深入于民间的民话和箴言，所含的理论并不怎样高深，有的重述了几千百年，而大众并不加以厌弃，否，反而愈感觉亲切。所谓习惯成自然，也就是条件反射积久而成为无条件反射。故而我们总要把抗战理论这个简单的条件，刻刻在大众中生出反射，处处在大众中生出反射，使他习惯了便自然地群趋于抗战的一途，而毫不踌躇，毫无考虑。近来听说又有人在鼓动着“反差不多”的论调了，主旨是嫌抗战理论过于单纯，而大家说来说去，说了半年，反正都“差不多”，因而激起了一些“反”感。抱着这种“反”感的君子，朝好处说，自然是过于高尚了一点，朝坏处说，害的是于不知不觉之间犯着了为虎作伥的嫌疑。这种想念，在我们文化人自身是应该彻底克服的。

要之：（一）在抗战时期中，一切文化活动都应该集中于抗战有益的这一焦点。（二）抗战必须大众动员，因而一切文化活动必需充分地大众化。（三）在使大众与文化活动迅速并普遍地接近上，当要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彻底的自由，并要求战时教育的实施。（四）抗战言论不厌其单纯，并不厌其重述，应该要多样地表现它，并多量地发挥它。（五）对于抗战理论嫌其单纯，嫌其重复的那种“反差不多”的论调，或故作高深或高尚的理论以渡越流俗的那些文化人，事实上是犯着了资敌的嫌疑。——这些是我在这篇小文中所拉杂叙述了的几个要点。

（选自《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丙编）

抗战以来的文艺思潮

——纪念“文协”成立五周年——

郭沫若

在抗战尚未开始之前曾有人为文艺担忧，以为战争一开始，爱国的作家必然投笔从戎，文艺便会遭遇重大的损失，或者甚至至于停顿。然而在抗战进行已经五年有半的今天，确实地证明了这种想念纯然是杞忧了。抗战以来，文艺不仅没有停止它的活动，反而增加了它的活动；不仅没有降低它的品质，反而提高了它的品质。

抗战初起时，由于战争的强烈刺激，在文艺界曾经激起过一番剧烈的震动，确是事实。多数文艺性的期刊和报章附刊，不是完全停止便缩小了范围；口号式的诗歌，公式化的独幕剧曾盛行一时；小说的地位几乎全被报告速写所代替。其后随着战争的长期化，这种兴奋状态镇静了下来，文艺的步骤渐渐恢复了它的常态而且大有进展。虽然有人也在高喊着“文学的贫困”，但仅是不看事实的信口雌黄而已。

国家临到争生死存亡的关头，民族受着了空前未有的浩劫，一切都应该为了前线，所以有“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号召。作家在这种号召之下大多数是动员起来了。虽然在初期也有少数的人唱导“与抗战无关”论，但为大势所迫，不久也就消声匿迹。近来如沈从文先生又有“反对作家从政”的见解，在沈先生或许是一片好意，认为作家应该站在自己岗位上努力，不宜旁骛。这在平时是不会成为什么问题

的议论，但在战时却可大成问题，而且把作家努力参加动员工作认为“从政”，那也不免是超过误解范围的诬蔑。这事是值得从文先生反省的。

为了要动员大众，文艺界曾有“旧瓶装新酒”的主张和尝试，便是利用旧有通俗的形式如弹词、鼓词、民歌、旧剧、章回小说等，以便于一般的接受。这是偏重于宣传与教育的意义，已经产生了不少的作品，并收到了不少的效果，是无可否认的。这一种运动除动员大众之外，使作家于习用现代的新形式之余，回顾了本国的遗产，在无形之间摄取了旧时的优点，而使新旧起了一番综合，在文艺上说来，也不能不认为是较为重大的收获。但有人把这种运动的意义过份夸大，否认五四以来的新文艺的成就，而认为一切文艺应从通俗的文艺再出发，那却是一种有害无益的偏见。为克服这偏见，曾经有长期的关于“民族形式”的检讨，大率已经是得到了它应有的结论了。

文艺的生命是在内容，作家的生命是在生活。大时代使作家的生活改变而充实了，文艺的内容自不得不因而充实。作家须与大众打成一片，向大众的生活学习，从而作生活的反映与批判，作品自能亲近大众而为所接受。既成的形式我们自当作为历史的贡献而宝贵它，然而已经失了时代性的东西决无法恢复其旧有的势力，尊重民族形式并不是复古，那是无容置辩的。

经过五年半的战火的锻炼，使战前的文艺思想更加钢铁化了。例如反帝反封建的主潮变而为抗日=反法西斯的号召，这只是性质的更加明朗化，力量的更加集中化，并没有本质上的什么变更。法西斯主义即是封建帝国思想穿上现代帝国主义的武装。日德意三个轴心国家都是封建思想未能扬

弃，而产业近代化了的怪物，它们同走向法西斯主义而成为一个集团，实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而我们战前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潮汇流而为反法西斯运动，也正自有我们的历史的必然性。故尔五年半来的战火只是证实了五四以来的路线的正确，因而也就无法抹煞五四以来的光辉的战果。

抗日 = 反法西斯，这是民族解放的意识发露，也就是新现实主义的骨干。以此为骨干的中国新文艺在作为其血与肉的资源上有赖于古今中外的题材。任何材料都可以供作者驱使，只要你作者有驱使它的能力，有充分的研究和调查。关于题材问题，一时曾相当狭隘，而且至今也还有人抱着这样的见解，以为必须直接采自抗战的现实，这可以说是画地为狱。但我这样说也并不就是赞成了“与抗战无关”论者的意见，“与抗战无关”论者是作家的精神脱离抗战，或超越抗战，这就是所谓非现实主义。我们却要扩展题材的范围，是把与抗战有关的关系扩大了。我们在同一的主题之下，不仅要写现代的题材，也要写古代的题材，不仅要写中国的题材，也要写外国的题材。现实主义所谓“现实”不是题材上的问题，而是思想认识和创作手法上的问题。尽管是眼前的题材，如以“与抗战无关论”者来写，便成为非现实。尽管是历史上的题材，如以正确的意识形态来写，便成为新现实。这是易明的事理。近来题材的范围确实是扩大了，因而也就是新现实主义活动的范围更加扩大了。

但有一部分的批评家对于这现实与历史的关系似乎不甚了解，每每以为写历史题材便是“逃避现实”或“不敢正视现实”，这正是非现实主义的了解，因为评者本身并未懂得现实主义究竟是什么。现实主义并不是单纯的写实主义，它必须“彰善阐恶，树之风声”，因而它的骨子里面便不免有

“刺”，中国的儒家经典中的《诗三百篇》，差不多没有一篇没有“刺”。“刺”于文艺的存在可以说等于自然属性，就好象世间上没有没刺的蔷薇，没有没刺的蜜蜂。你假如怕“刺”，最好是谨慎些不让自己有被“刺”的弱点。“言者无罪，闻者足以戒”，总不好因手指被“刺”，而把蔷薇全部拔掉吧。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一日。

（选自《沸羹集》）

新的现实与文学上的新的任务

周 扬

一、摆在作家面前的新的问题

旧的生活已经破坏 新的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记得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说过，社会剧烈变革时期的每一月，那内容的丰富，可以比上平时的一年；这句话可以应用于正在抗战中的目前的中国。空前规模的大抗战坚持了十个月了，在这十个月当中，中国民族在变化着，前进着。旧的在被血所洗涤，新的正在向刚健的形成的过程中，一切的人们都被民族革命的暴风所冲击震荡，而被冲击震荡得特别厉害的是一群特别的人——作家、艺术家。我这并不是指由于文化中心城市的陷落，作家失去了出版上的依靠，因而生活上发生了恐慌的等等事实而言，这些对于作家固然有重大的影响，但是其他职业部门的人也都同样或甚至更厉害地遭受了战争的打击，我的意思是指精神上说的。

我称作家为特别的人，是有两重的意义。第一，作家是敏感的分子中的最敏感的，他对于时代的脉搏的每一跳动都能够强烈地感觉着；第二，作家是借形象的手段去表现客观真理的，而形象又是必须从现实中，从生活中去吸取。没有实际生活的经验就决写不出真实的艺术作品。作家必须到实际生活中去体验。过去，我们的作家曾经因为自己创作力的不旺盛而诉怨过周围生活的沉滞和平凡。现在，我们的国家里正发生了轰轰烈烈的事变，全国的生活都在绕着战争的轴心旋转，这种生活正是作家所渴望了许久的。他们带着很大的激动和喜悦欢迎了它，但是要立刻把自己卷入这个生活的漩涡的中心，那就还得克服横在他们面前的一些困难和阻力。

旧的环境虽是不值得留恋的，但那究竟使作家有生活上的安定和从容写作的余裕和心情，现在这些都失去了。一种生活，习惯了之后，就不容易改变。作家的生活尤其如此。我们的大部分的作家，都并不在企图建立适合于抗战环境的新的生活，而只是努力在把过去那种作家式的生活在可能的条件之下恢复起来。这只要看一看许多作家都集中在武汉以及最近出版物之逐渐增多而趋于千篇一律，就可知道了。这里我并不要抹杀有的作家已经从书斋走到了战地，然而这只是一小部分人的个别的行动，还没有在作家，至少青年作家中间形成一个广泛的运动。同时我也并不主张所有的作家都丢下笔拿起枪上战场去。那不但是不可能，而且是不必要的；相反，作家应当随时随地运用他所熟悉的现成的武器——笔来服务于抗战，写关于抗战的作品。无论是报告、通讯或甚至简单地煽动的宣传品。有一个要求是无条件的：作家的生活应和抗战的实际紧密地联系着。我们要反对那种不愿

与大众为伍，不屑做抗敌救亡的日常工作，而自鸣清高，孤芳自赏，以文学为至上的观点。不幸的，这样的观点竟反映在一二进步作家的身上。他们对于开会，募捐，慰劳，教育难民，作军队里政治指导员，写钢板，作壁报等等的工作表示了极大的嫌厌，他们大声疾叫这些工作是应该别人做的，文学家不应该做这些事。

“这些事不是我做的。让一般的知识分子去做吧，我忙得很，我正在埋头于一个伟大的作品的创作。”

说这话的，是一位很优秀的青年作家，听说他并没有实践他自己的话，就是说，他并没有埋头于“伟大作品的创作”，而仍然是在军队里跑动，不时地写着报告，通讯一类的小型作品。这自然是可庆幸的事，但是他的疾叫却表现了一种倾向，在新生活的巨大的吸引力面前徒然抗拒的倾向。

作家被两种力所牵引着：抗战引导作家走向更紧张的生活去，旧的生活习惯却总是绊着他的脚。因此，作家虽对自己的生活感到了动摇和不满，然而还不能够立刻建立一种新的生活来代替它。这也就是为甚么他们“成天飘来飘去”且不能不以这种“飘来飘去”为痛苦。这种抗战生活中的“感觉”，“心境”，正是战时知识分子无着落的生活的反映。正是作家的生活的苦恼，同时也就是他们正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力图解决的一个问题。突入生活的核心，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主要的关键。

新主题的困难

假如没有生活经验也能写出好的作品，那末作家生活的问题就不会这么严重吧。要作家参加抗战，服务于抗战，这不只是一种政治上的要求，而同时也是创作本身的要求。因

为抗战不但改变了作家的生活，同时也改变了一切中国人的生活。生活变化了，为着叙述生活的真实，就有要不落后地跟生活合着步调一同前进的必要。假如，作家让战争的风暴在四周围吹打，自己却紧紧地闭上窗子，把表现抗战的主题所必须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个人琐屑的主题和题材上面，花在故事的巧妙的安排，文字的雕琢，技巧的卖弄上面，那就只是心血的浪费，不但引不起读者的共鸣，也不会成为伟大的作品。或者是，并不深入生活的底层，也并不肯多研究一点具体的生活的材料。而单单凭据几篇政治论文，剪接新闻上的一些消息，就写成抗战主题的作品，那也只会产生出空洞的概念，标语口号的东西。

了解抗战的情势和每一新的发展以及它对于全国人民的意义，对于作家固然是重要的，但那只能做成一个政治的报告，要把它们变成艺术的言语，那就还需要下一点工夫。作家必须在那具体性上去了解生活。而作为文艺作品之基本材料的是活生生的人。要描写抗战，首先就要描写在抗战的具体环境下行动着的一个个的中国人。而这是怎样一个变化万端令人惊异的环境呵！在这个环境之下，人又是变化得怎样的迅速呵！昨天还是落后的，今天变成了进步的；昨天还是愚蒙的，今后变成了觉醒的；昨天还是消极的，今天变成了积极的。革命时期必然地伴以人类心灵上的深刻剧烈的变化，只适合于社会停滞期的艺术家的那种静的看法现在是完全不适用了。我们的现实中正涌现着新的人，新的抗日英雄的典型。我们不能把他写成平时的人一样，因为抗战的不平凡的环境已经使他变质；同时我们也不能把它描写成理想的化身，因为在他身上还负有过去历史的负担。假如说表现抗日英雄的典型是我们作家的一个最光荣的任务，那末，不能

不说这这也是一个最艰难的任务。

中国新文学中可以称为不朽的典型的，只有鲁迅的阿Q。在这个可笑又可悯的人物身上，反映出了中国农民的软弱的黑暗一面，因为中国的农民性和落后性，他又被视为中国国民性的代表者。现在，阿Q们抬起头来了。关于觉醒了的阿Q，值得写一部更大的作品。然而在今日的文坛上，有谁能够了解中国人民象鲁迅那样的深刻呢？我们的作家已经开始作了创造抗战中人物典型的企图，但是那企图并没有能够圆满地实现。欧阳山，东平等集体创作的《给予者》便是一个例子，作者不知是故意还是不自觉地，把知识分子所特有的细致精微的感觉，思想，和哲理深奥的言语加在普通工农士兵的身上，一个一字不识的士兵的嘴里竟会说出什么“灵魂的纵深地带”，“强烈的内在的活动”等等字眼，那听来实在叫人难于相信。我们的作家应当学一学鲁迅对于人物的性格的描写，以及成为那描写的重要一部分的人物的对话。如象阿Q，如象孔乙己，如象九斤老太那些人物的那种活生生的对话。当恩格斯说现实主义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之正确的传达”时，他并没有忽视作为文艺上的现实主义之一特点的“详细情形的真实性”。

详细情形的不真实正表示了作家对于自己所采取的主题的生疏。抗战对于我们的作家是一个生疏的主题。作家对于抗战的各个方面和复杂过程还不熟悉。即使在理论上能了解，也还不见得就能用艺术的言语表现出来。比如，对于抗战，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抱着最后胜利的信心，但同时也要知道，我们的敌人是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而我国本身又存在着许多弱点，所以要最后战胜日本，还需要相当的时日，这中间还要经历许多的弯曲和种种可能的挫折与失利。

这理论，我们的作家也未尝不懂得，然而在他们的作品中却常常把这个最后胜利容易化简单化了，总是所谓“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如何如何”末了是“最后胜利属于我们的”一套。我们反对民族悲观主义，然也不赞成廉价的乐观主义。作品要灌输群众以胜利信心。那决不是凭一时的兴奋的作用，而必须靠深长的教育的效果。它应当告诉读者：抗战中迁到了些什么困难和缺点。它们怎样障碍着抗战的发展，而抗战的发展又怎样在一步一步克服它们。要表现出这些来，那就非十分熟悉抗战各方面的具体情形不可。

然而我们的作家大部分都没有参加过战争，甚至也没有到战场上去看一看，连战争的基本常识都常常是缺乏的。在某一次的绘画展览会上，有一幅画画着一个火线上的抗日军人，一只手举起望远镜，另一只手把手枪瞄准着前面。这自然是一幅抗战的图画，但是一位有军事知识的人立刻看出了这画的破绽，因为用望远镜照的时候一定是还和敌人保有相当的距离，远非手枪的射程所能达到的。这不过是一个小例子。作品中关于战争的某些细节的描写使读者或观众失笑的事是常有的。这就可见：写自己所不熟悉的题材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我们的作家在创造典型的时候不要忘了“详细情形的真实性”是和典型的正确的传达分不开的。

今天的抗战是一个不但对于作家是新奇的，就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前所未见的主题。作家现在还不能十分把握它，那有什么奇怪呢？现在向作家要求关于抗战的伟大作品，不但为时尚早，且足以招致和现实的脱离或不成熟的早产的有害结果。作家现在和全国人民同处在与最顽强的敌人艰苦作战的状态中，他应当在这个战斗的实践中贮蓄为表现时代的历史的主题所必需的精力，准备将来伟大的作品。

小形式的问题

产生以抗战为主题的大作品。无论从作家写这种作品所必需的时间和精力上说，或是从出版的条件和一般读者的需要上说，都是困难的。事实上，抗战以来，长篇形式已经退到了最后的地位，在战时的文坛上演了最活跃的角色，是报告通讯一类的小型作品。报告文学差不多成为一个非常流行的运动。在广州，由几位青年作家组织了一个文艺通讯站，有计划地来推动这一个运动。此外还有朗诵诗歌，活报等新形式的提倡和时调、鼓词甚至皮簧戏等旧形式的改良与采用。这些形式最适合于战争的情势和需要，是抗战期文艺的主要的形式。但是就在这一方面，我们也不是没有困难的。

报告文学的制作者大都是第一次把名字印在纸上的青年作家。许多既成作家因为没有实生活，所以写不出报告文学，而报告文学者常常给技巧的不足损坏了自己的作品。他们有生活经验，有丰富感情，但他们还不熟练于驱使题材，驾驭字句，也不善于运用想象，控制情感，所以，他们的作品常常弄成了贫弱无力的，不是近乎枯燥的新闻记事，就是流于空洞的主观叫喊。虽然这样，这批抗战中的文艺新军的出现，对于中国新文艺的发展，仍然是有极大的意义的。

关于文艺的通俗化，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在抗战以后特别地热烈，而在创作实践上利用旧形式的尝试也日见增多，但是这一方面的努力比起客观的需要来，却还是非常不够。原因是：我们的作家大都习惯于欧化的知识分子的文字，一向以少数的所谓高级读者为满足，从没有把教育广大落后群众当作自己的责任，似乎也并不屑于和张恨水争夺读者，因